

中国网络政治的兴起与  
政治文化的变迁

熊光清

东亚论文 第 93 期

ISSN 0219-1415  
ISBN 978-981-07-1869-5

版权所有 · 未经同意 · 不得转载

出版日期：2012 年 3 月 20 日

# 中国网络政治的兴起与政治文化的变迁

熊光清\*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信息通讯技术的迅速发展与互联网的广泛使用对中国政治产生了重大影响，其重要表现就是，中国网络政治开始兴起，并获得了迅速发展。所谓网络政治，是指现实政治现象和政治过程以网络为媒介，在网络空间中的进一步展开和体现。网络政治不仅与现实政治表现出密切互动的关系，而且在更深层面对于政治文化的变迁也产生着重要影响。中国网络政治的兴起和发展无疑影响着并将进一步推动中国政治文化的变迁。从目前情况看，网络政治参与、网络结社、网络政务和网络政治社会化等形式都对中国政治文化变迁产生着深刻而显著的影响。中国网络政治的兴起推动着中国政治文化向参与型政治文化和现代公民文化转变，推动着中国政治文化更加倾向于理性、温和与客观，更加倾向于民主、公平与透明。

## 一、政治文化与政治文化变迁

### 1. 政治文化的内涵、构成与类型

20世纪50年代，随着政治发展研究的兴起和展开，政治文化研究开始进入政治学者的视野。1956年，美国学者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Gabrial A. Almond）把“政治文化”（political culture）纳入了政治学的研究范畴，他认为，每一种政治体系都根植于政治行为倾向的特定方式中，用政治文化来代指这种现象是很有用的。<sup>1</sup>此后，阿尔蒙德等人对政治文化进行了深入研究，并把政治文化发展成为一种解释政治发展的分析工具，引起了许多学者的重视和兴趣。<sup>2</sup>

---

\* 熊光清，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副教授，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访问学者。

<sup>1</sup> See Gabrial A. Almond, “Comparative Political Systems”,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18, no.3 (Aug. 1956): 391-409.

<sup>2</sup> 阿尔蒙德等人的政治文化理论在产生广泛影响的同时，也受到了很多质疑，他们关于政治文化的理论解释和研究方法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一直是学术界争论的焦点。1980年，阿尔蒙德和维巴主编了“*The Civil Culture Revisited*”一书，从不同角度和立场对20年来政治文化研究的成就和影响进行了分析和评论，并对学术界关于政治文化理论的质疑进行了回应。See Gabrial A. Almond & Sidney Verba (eds.), *The Civil Culture Revisited*,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80.

那么，应该如何定义政治文化呢？1963年，阿尔蒙德和西德尼·维巴（Sidney Verba）在《公民文化——五个国家的政治态度和民主制》一书中，将政治文化界定为“作为被内化（internalized）于该系统居民的认识、情感和评价之中的政治系统”。<sup>3</sup> 1978年，阿尔蒙德和小G·宾厄姆·鲍威尔（G. Bingham Powell, Jr.）在《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一书中，对政治文化给出了更明确的定义，他们认为：“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这个政治文化是由本民族的历史和现在社会、经济、政治活动进程所形成。人们在过去的经历中形成的态度类型对未来的政治行为有着重要的强制作用。政治文化影响各个担任政治角色者的行为、他们的政治要求内容和对法律的反应。”<sup>4</sup> 简单地说，政治文化就是指人类在政治活动过程中积淀下来的相对稳定的政治认知、政治态度、政治情感和政治信仰等精神层面的因素。

政治文化主要包括政治认知、政治态度、政治情感和政治信仰等四个方面的要素。政治认知指政治主体对政治客体及其行为过程、行为方式或行为规律的认识、判断和评价。政治认知为政治态度、政治情感和政治信仰提供知识基础，并成为这些精神活动的起点。政治态度指政治主体植根于政治认知而对政治客体的基本看法和心理反应，表现为政治主体对政治客体或肯定或否定、或赞成或反对的基本看法和精神状态。政治情感指政治主体对政治客体在认知过程中所产生的内心体验和感受，是伴随政治主体的政治认知过程所形成的对政治客体的好恶、爱憎、美丑、亲疏、信疑等心理反映的统称。政治信仰指政治主体对特定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的认同、接受、信服和敬仰的心理倾向，并把这种意识形态和政治目标奉为行动准则且付之实践的精神状态。总体而言，一方面，政治文化直接表现为这些作为存量的精神层面的因素；另一方面，这些存量的精神层面的因素又会对特定政治主体的政治行为、政治认知、政治态度、政治情感和政治信仰等产生深刻影响，并由此形成政治文化的传承机制。

关于政治文化的类型，阿尔蒙德和西德尼·维巴将政治文化划分为村民政治文化（the parochial political culture）、臣民政治文化（the subject political culture）和参与者政治文化（the participant political culture）三种类型。在此基础上，他们提出了一种以参与者政治文化为主体的混合类型的政治文化，即“公民文化”（civic culture），这种公民文化是“一种政治文化和政治结构相互协调的参与者政治文化”，“在公民文化中参与者政治取向与臣民和村民政治取向是结合在一

<sup>3</sup> [美]加布里埃尔·A. 阿尔蒙德、西德尼·维巴：《公民文化——五个国家的政治态度和民主制》，徐湘林等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8年版，第13页。

<sup>4</sup> [美]加布里埃尔·A. 阿尔蒙德、小G. 宾厄姆·鲍威尔：《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曹沛霖等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7年版，第26页。

起的，而不是前者取代后者”<sup>5</sup>。他们认为：“公民文化看来特别适合于民主政治系统。它不是民主政治文化仅有的形式，但它似乎是与稳定的、民主的系统最协调的形式。”<sup>6</sup>在现代政治发展进程中，公民文化的形成十分重要。金太军认为：“政治的现代化或民主化进程必然伴随着政治文化的现代化，没有现代民主的参与的公民政治文化的支撑，政治制度和政治生活的民主化也就难以实现和持续。”<sup>7</sup>可以说，公民文化的发展和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是政治发展的必然趋势，一旦这种文化形成，不仅有利于推进政治发展的进程，而且有利于巩固政治发展的成果。

## 2. 政治文化的变迁

文化具有延续性和变迁性。文化是人类本质的显现，人类在改造自然的同时改造着自身，在创造文化的同时把自身改造成具有文化传承能力的“文化动物”。文化是在延续中存在和发展的，一切文化成果都是在以往所创造的文化财富基础上累积而成的，后人的文化活动也都直接或间接地依赖于前人的文化传统。失去延续性，文化就失去了存在的依据和发展的前提。正是由于文化的延续性特点，文化传统才得以形成并会不断变得深厚，从而彰显出民族或区域文化的特色。在一种文化发展的初期和前期，延续性显得特别重要，这一时期，主流文化能良性整合各种亚文化的有益成分，从而促成此种文化类型的形成、发展和成熟。但当一种文化类型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延续性可能就会造成这种文化类型的僵化与迟滞，从而对这种类型文化的发展产生负面影响，在这一时期，文化的再发展往往取决于文化批判与文化传承之间的良性互动，通过对传统的创造性转换，使文化实现新的发展，并得以延续，这一过程就是文化变迁的过程。美国学者史蒂芬·切尔顿（Stephen Chilton）认为：“文化（因而包括政治文化）被理解为可以超越个体，但是，在很大程度上，个体的行为并非完全是消极的。事实上，个体一方面被文化所社会化，同时，他们又创造和再创造它。”<sup>8</sup>也就是说，人类不只是单纯地适应文化，而且会对文化产生影响；并且，文化具有延续性，但它又不是一成不变的，它的延续性只有在变迁中才能实现。

<sup>5</sup> [美]加布里埃尔·A. 阿尔蒙德、西德尼·维巴：《公民文化——五个国家的政治态度和民主制》，徐湘林等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8年版，第29页。

<sup>6</sup> [美]加布里埃尔·A. 阿尔蒙德、西德尼·维巴：《公民文化——五个国家的政治态度和民主制》，徐湘林等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8年版，第443页。

<sup>7</sup> 金太军、王庆五：《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新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263页。

<sup>8</sup> Stephen Chilton, “Defining Political Culture”, *The Western Political Quarterly* 41, no. 3 (Sep. 1988):419-445.

与文化的这种特征相类似，政治文化也具有延续性和变迁性。一方面，政治文化是一种观念形态，它具有延续性，即使一定国家或区域的政治、经济、文化发生变更，原有的政治文化的内涵还会继续存留在人们的思想观念深处，不可能完全消失或者根本就不会消失。美国学者彼得·穆迪（Peter R. Moody Jr.）认为：“如果用文化来解释政治，关注点就应更多集中于延续性而不是变化。文化在持续性行为模式中的体现是明显的，而如果特定的文化模式是持续的，那么，特定社会的政治活动在不同条件下可能就会持续表现出相似的风格。”<sup>9</sup> 也就是说，政治文化不仅会使文化的内涵延续下去，而且会持续影响政治活动，使之表现出一定的特色。另一方面，政治文化又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总是处于不断的变革过程中，一定历史阶段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领域的变化会对政治文化产生影响，导致政治文化发生一定的变迁。美国学者特里·N. 克拉克（Terry N. Clark）认为，随着社会领域的变化，政治文化也在发生变化，由此产生了“新政治文化”，“世界范围内政治体制的变化包含了新政治文化的重要元素——对等级体制的反动，新政党和新问题的兴起，侍从主义的削弱，脆弱的新领袖的涌现。”<sup>10</sup> 简单地说，政治文化变迁就是随着时间推移和环境变化，在各种社会因素影响下政治文化的要素发生变化的过程。

### 3.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及其变迁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存在不少优秀的成分和因素，但是，也有许多与现代政治发展进程相左的成分和因素。从秦汉时期到明清时期，君主专制制度不断发展并得到加强，这决定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在本质上是以维护王权为核心的政治文化。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具有典型的臣民政治文化特征。美国学者白鲁恂（Lucian W. Pye）对中国政治文化进行过系统研究，他认为：“特殊关系网络转变成派系的过程清晰反映了中国文化关于权威、依附及其相互关系的态度。领导者与追随者彼此需要，这种需要对他们同等强烈。因而，领导者或追随者任一方的紧张或焦虑情感倾向于使双方的关系获得强化和政治化而不是使之削弱。”<sup>11</sup> 政治权威在人类社会从原始状态向文明过渡的过程中也起到过一定的积极作用。然而，作为一种政治文化现象，权威崇拜的极端化会导致人的独立个性和政治自主意识的泯灭，从而造就专制政治的文化基础。传统中国正是这样，王权主义养育出遍及全社会的权威崇拜心理。<sup>12</sup> 特别显著的是，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臣民意识

<sup>9</sup> Peter R. Moody Jr. “Political Culture and the Study of Chinese Politics”, *Journal of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14, no.3 (Sep. 2009): 253-274.

<sup>10</sup> [美]特里·N. 克拉克、文森特·霍夫曼-马丁诺编：《新政治文化》，甘荣坤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121 页。

<sup>11</sup> Lucian W. Pye, *The dynamics of Chinese politics*, Cambridge: Oelgeschlager, Gunn & Hain, 1981.p186.

<sup>12</sup> 参见葛荃：《权威崇拜与政治参与意识》，载《学术研究》1989 年第 2 期，第 26-28 页。

深深根植于人们的政治意识之中，而公民意识则非常缺乏。

对于中国政治文化变迁而言，传统臣民政治文化向现代公民政治文化转变必然是一个非常复杂和艰难的过程。当前，传统政治文化在中国社会中仍然具有一定的生存土壤，政治文化的全面转型尚需时日。中国学者刘泽华认为：“由臣民意识向公民意识转变，是中国近代政治观念发展中一个基本问题。由臣民意识转变为公民意识，是一个极为复杂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极为困难和痛苦的过程。”<sup>13</sup>但是，也应注意到的是，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中国政治文化变迁的局面已经显现，特别是网络政治的兴起与发展必然推动中国政治文化的变迁。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互联网一直呈现出蓬勃发展的良好态势，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网络政治获得迅速发展。中国网络政治的迅速发展不仅直接影响到中国政治发展的进程，而且对中国政治文化变迁也产生着深刻而长远的影响。

## 二、中国网络政治的兴起及其对政治文化的影响

### 1. 网络政治参与对政治文化的影响

中国网络政治的兴起和发展使得中国公民获得了一种全新的，与传统政治参与方式完全不同的政治参与途径。网络政治参与具有鲜明的特色。一是开放性强。开放性是互联网最根本的特性，整个互联网就是建立在自由开放的基础之上的。开放性意味着任何人都能够得到发布在网络上的信息，意味着任何个人或者组织（包括各种类型的政府组织与非政府组织）都不能完全控制互联网。政府推进了网络基础设施的发展这一事实，并不一定意味着政府总是可以控制互联网。一旦网络基础设施建设起来，它就属于公共领域中的公共产品。<sup>14</sup>互联网的这种开放性无疑增强了网络政治参与的透明性、平等性和公开性。二是互动性强。互联网的影响力是建立在互动、分享的环节之上的，网络能通过互动平台把信息直观地展现出来，这十分有利于网络政治参与者互相交流政治经验，学习政治知识和政治技能。三是直接性高。在互联网上，网络政治参与者可以相当自由地对政治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和意见，可以有机会直接与党和政府领导人进行对话和交流，并可以直接参与网络投票或网络选举活动，从而可以培养网络政治参与者理性、宽容和合作的精神，积累以信任为基础的社会资本，并使网络政治参与者获得丰富的直接政治经验。四是多中心性。网络以离散的、无中心的结构模式进行运作，基本上消除了身份歧视，使传统的、统一的政治控制方式难以为继，增强了网络政治的民主精神。网络政治的这些特色极大地激发参与者的热情和兴趣，并使参与者的政治态度和政治认知发生变化，从而强烈冲击着中国传统政治文化

<sup>13</sup> 刘泽华：《从臣民意识向公民意识的转变》，载《炎黄春秋》2009年第4期，第76-81页。

<sup>14</sup> See Zheng Yongnian, *Technological Empowerment: The Internet, State, and Society in China*,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p.35.

的权威主义特质。

网络政治与现实政治是密切相连的，它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现实政治的反映和延伸，因而，网络政治参与方式的变化必然会对现实存在的政治文化产生影响。普拉莫德·纳亚尔（Pramod K. Nayar）认为：“网络政治的重要性在于，网络空间和虚拟环境（虚拟社团）不仅仅是现实的模拟，而是本质上就构成它们自身所处的环境。虚拟的现实要求把抽象的社团看作它们自己的独立的、以自我为参照物的实体。”<sup>15</sup> 通过网络政治参与，公民可以对政治问题、社会问题和重要事件发表意见和进行讨论，可以参加相关投票或选举活动，并且，这种投票或选举能使现实政治生活中的干扰因素降到最低程度，从而保证每个政治参与者可以独立地按照自己的意愿进行判断和选择。公民在网络政治参与过程中，一定程度上相当于直接参与了政治实践，能够亲身体验政治生活的意义，了解和感受作为一个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同时，在网络政治参与过程中，参与者面临着网络中各种各样丰富的政治信息，这就要求他们有较强的政治鉴别能力。这种政治鉴别能力表现在：要善于分析纷繁复杂的各种网络信息，能够对国际形势和对国内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重大问题做出正确分析和判断，冷静观察、思考和处理问题，透过现象看本质，是非分明，而不人云亦云，不随波逐流。这样，对于网络政治参与者，特别是经常通过网络参与政治过程的公民，可以提高政治鉴别能力、增强政治参与意识和改变政治行为模式，由此就可能导致整体上政治文化的变化。

## 2. 网络结社对政治文化的影响

互联网与传统媒体有很大的不同，它不仅提供了一种新的监督方式、参与平台和参与渠道，而且使组织公众和动员公众的成本大大降低了。通过互联网，中国公民获得了一种新的结社方式，网络虚拟社团的兴起正是这一特点的显现。网络虚拟社团就是网络空间中的个体为了分享共同利益而通过一定的信息手段，例如：网络聊天室、在线论坛、公告栏和电子邮件，经常进行联系而形成的相对稳定的集合体。<sup>16</sup> 网络结社是一种新的结社方式，与传统的社团相比，网络虚拟社团组织起来更方便，成员的地域和身份几乎不受限制，成员的交往空间获得了很大的扩展，这样，就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传统结社方式的局限性。毫无疑问，网络结社大大加强了公民之间、各种社会组织和社会群体之间的联系，使他们可以在网络中形成种种纵横交错的复杂关系，增强参与的频度和效率。<sup>17</sup> 目前，中

<sup>15</sup> Pramod K. Nayar, *Virtual worlds: culture and politics in the age of cybertechnology*,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Ltd, 2004. p176.

<sup>16</sup> See Yung-Cheng Shen, Chun-Yao Huang, Chia-Hsien Chu, and Hui-Chun Liao, “Virtual Community Loyalty: An Interpersonal-Interaction Perspectiv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lectronic Commerce* 15, no. 1(2010): 49-73.

<sup>17</sup> 参见熊光清：《中国网络社团兴起的影响：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视角》，载《南京社会科学》2009年第11期，第65-70页。

国网络社团主要有以下几种组织形态：在网络论坛基础上形成的虚拟社区、一些网站中的专题论坛和网上俱乐部、利用网络发起的志愿服务组织和公益性活动组织。由于中国现有制度环境严格限制社会团体的发展，严格控制社会团体的运作，从而制约着社会团体实力和规模的发展壮大，使中国公民的结社行为受到很大约束，这样，网络结社作为一种不受约束的结社方式，就成为中国公民实现结社意愿的重要方式。从当前中国网络社团运作和发展的实际情况看，网络社团还不是正规的、正式的社会团体，但具有社会团体的某些特点。

网络虚拟社团为公众获取信息、传播信息和发表意见提供了开放、自由和平等的巨大平台，有相同政治志趣和政治倾向的网络参与者结合在一起，导致产生了大量网络虚拟社团，这些网络虚拟社团的参与者在网络虚拟社团的活动过程中，其自主意识、平等意识和竞争意识必然会不断增长。特别重要的是，中国网民具有一些与其他国家网民不同的特点，这就是，网络几乎成了许多中国公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网络活动成为许多中国公民的一种重要生活方式，很多人一天不上论坛看看帖子、灌灌水就觉得难受，他们非常乐意在网络空间中就公共事件和政治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这使得中国网民更加乐意参与网络结社。网络社团在无形中就可以将大量网民聚集在自己旗下，它们利用网络平台发布信息和进行组织协调，能迅速突破地域限制而产生巨大的影响。中国网络社团的兴起会培养公民的民主意识和自主意识，实现政治行为个体从臣民向公民的转变。网络社团活动的参与者可以学到一定的组织管理能力，学习自立和自治，学会依靠自己的能力解决问题，这就会培养他们的自主意识和自立精神。网络社团的生活具有很强的民主性，可以把公民训练成为具有独立人格、能够明确自己的权利与义务、具有自主行动能力的社会人，并培育公民的现代民主价值观念。同时，通过网络虚拟社团活动，公民还可以增强政治表达意愿、提升政治表达能力、提高集体行为能力，并培养民主政治所需要的理性精神、宽容态度和合作技能。

### 3. 网络政务对政治文化的影响

网络政务就是政府机构运用现代化的信息通讯技术，将政府管理和服务职能通过精简、优化、整合、重组后通过互联网予以实现，以打破时间、空间和条块分割的制约，从而加强对政府工作的有效监管，提高政府的运作效率，并为公众提供高效、优质、廉洁的一体化管理和服务。网络政务实质上是对现有的、工业化时代的政府形态的一种改造，即利用信息通讯技术来构造更适合信息时代的政府结构和政府运行方式。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政府全面启动“政府上网工程”，由此拉开了中国网络政务发展的进程。截至2009年底，中国已建立政府门户网站4.5万多个，75个中央和国家机关、32个省级政府、333个地级市政府

和 80% 以上的县级政府都建立了电子政务网站，提供便于人们工作和生活的各类在线服务。<sup>18</sup> 中国网络政务的兴起和发展，电子邮件、网上信息发布、信息资源共享、网络办公系统、网络问政、网络咨询与网络协商等方式的使用，明显提高了行政效率，并拉近了政府与普通公民之间的距离。随着中国网络政务的兴起和发展，公民可以更加便利和清楚地了解政府工作程序，特别是公共权力的运作过程，促使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过程更加公平化和透明化。并且，政府在决策和咨询过程中，可以通过网络进行民意调查和征询意见，这不仅可以有效吸收专家学者的建议和意见，还可以了解和掌握不同社会群体的意见和要求。这样，网络政务的兴起使得以参与、回应、互动为特征的新的决策理念开始渗透到公共生活领域，以科学理性、平等协商、利益协调为特征的新的决策模式开始产生，从而为公民政治文化的产生创造新的条件。

随着网络政务的兴起，一种新的民主监督形式——网络监督正在形成。网络监督是网络时代普通公民参与腐败治理的新形式，已经成为传统舆论监督或社会监督的重要补充。网络监督表现出明显的快捷方便、透明度高、安全性强、参与广泛等特征，它丰富了监督渠道，增强了监督力度，扩大了监督主体，从而可以在腐败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从发生学意义上讲，网络监督的发生源于网络技术进步对政治生活的积极影响，以及普通公民对合法权益和政治正义的维护；从形态学的角度看，网络监督的类型可以分为揭露腐败问题、抨击腐败现象和预防腐败发生等形态；从过程论的角度看，网络监督的行动逻辑可能从虚拟空间走向现实空间，从话语行为走向实际行动，从而实现二者之间的良性互动。中国政府十分重视互联网的监督作用，对公民通过互联网反映的问题，要求及时调查处理，并及时反馈结果。<sup>19</sup> 在 2003 年以来的不少重要网络事件中，例如：孙志刚事件、重庆钉子户事件、华南虎事件、瓮安事件、邓玉娇案、杭州飙车案、罗彩霞事件、磕头门事件等等，网络监督和网络舆论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并且特别可贵的是，在这些事件中，形成了网络世界与现实世界的良性互动局面，网络监督和网络舆论对公共决策和政治过程形成了一定的压力，从而推动了问题的解决和处理。<sup>20</sup> 网络监督可以成为中国民主监督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完善监督机制能够发挥

---

<sup>18</sup>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互联网状况》，载《人民日报》2010 年 6 月 9 日，第 14 版。

<sup>19</sup>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互联网状况》，载《人民日报》2010 年 6 月 9 日，第 14 版。

<sup>20</sup> 参见熊光清：《中国网络公共领域的兴起、特征与前景》，载《教学与研究》2011 年第 1 期，第 42-47 页。

重要作用，使中国公民获得了更便利的监督途径，从而有利于中国公民形成积极健康的政治态度，并有助于提高他们的政治效能感。<sup>21</sup>

#### 4. 网络政治社会化对政治文化的影响

政治社会化是在特定的社会政治关系和政治条件下，社会成员在政治实践基础上，通过政治生活和政治实践活动逐步获得政治知识和政治能力，形成政治意识和政治立场的过程。阿尔蒙德和小 G·宾厄姆·鲍威尔认为：“政治社会化是政治文化形成、维持和改变的过程。每个政治体系都有某些执行政治社会化功能的结构，它们影响政治态度，灌输政治价值观念，把政治技能传授给公民和精英人物。”<sup>22</sup> 在社会成员政治社会化的过程中，政治信息的传递、政治文化的传播都需要一定的渠道和媒介。这些渠道和媒介主要有：家庭、学校、社会团体、工作场所、大众传播媒介、选举和其他政治活动场合、民间组织，等等。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政治社会化的过程就是政治文化传承与延续的过程，特定的政治社会化媒介形成特定的政治文化环境，并承载着特定的政治文化要素。

互联网为网民提供了一种全新的、与传统媒介完全不同的政治社会化媒介，中国网络政治的兴起为中国公民政治社会化提供了新的渠道和媒介，并塑造着全新的政治文化环境。当前，中国公民政治社会化过程显得较为迟缓，一些公民政治社会化水平较低，这样，网络政治的便捷性、平等性和开放性就为普通公民的政治社会化提供了新的重要渠道，从而可以推进政治社会化过程，提高政治社会化水平，也为政治文化变迁提供了新的空间。网络政治过程本身就是政治社会化的过程，中国公民在网络政治参与过程中，可以学习政治文化和政治知识、了解政治问题和政治现象，并且获得政治参与所需要的政治技能，培养一定的政治情感和政治信仰，形成较为成熟稳定的政治人格，从而起到传承政治文化、教育社会成员、巩固政治统治的作用。随着互联网的广泛使用，网络政治将更加显现其在中国公民政治社会化过程的作用，成为公民政治社会化的重要媒介，这对于提高中国公民的政治认知和政治技能，塑造中国公民的政治情感和政治信仰，培育现代公民文化和社会资本，都会发挥重要作用。

<sup>21</sup> 政治效能感指一定的个体或社会群体对自身影响政治体系的能力和对政治体系就其要求作出反应的心理认知，它可分为内在政治效能感和外在政治效能感两个方面。这一概念由安格斯·坎贝尔 (Angus Campbell) 等人首先提出，他们认为，政治效能感是“个人的政治行动对政治过程所产生的影响力，也就是值得个人去实践公民责任的心理感受” (See Angus Campbell, Gerald Gurin and, Warren Miller, *The Voter Decides*, Illinois: Row, Peterson, 1954, p187.)。此后，一大批学者对政治效能感的基本理论和测量方法进行了研究与完善，并运用到实证研究中，取得了丰硕成果。

<sup>22</sup> [美]加布里埃尔·A. 阿尔蒙德、小 G. 宾厄姆·鲍威尔：《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曹沛霖等译，北京：东方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83 页。

### 三、中国网络政治影响政治文化变迁的主要表现

#### 1. 推动中国政治文化向参与型政治文化转变

网络政治的兴起对非参与型政治文化是极大的冲击，有助于中国非参与型政治文化向参与型政治文化的转型。当前，任何人只要持有具备联网功能的通讯信息设备，无论是计算机、手机，还是其他移动通讯设备，都可轻松通过网络参与政治活动，这极大地降低了公民政治参与的成本，调动了公民政治参与的积极性。网络是基于资源共享、互惠互利的目的建立起来的，公民进入网络获取信息、交换意见、表达观念时，相互之间是不可见的，并且是可匿名的，这样，公民就可以更自由地进行政治参与，这又极大地降低了公民政治参与的风险，提高了他们政治参与的热情。网络政治参与的互动性，使参与者能够获得良好的心理体验和感受，这极大地提高公民政治参与的兴趣。这使中国公民获得了极其便捷、畅通和有效的政治参与途径，并能极大地提升他们政治参与的深度和广度。

同时，中国政府顺应网络政治发展的形势，不断推进网络政务建设，这可以进一步扩大公民政治参与的途径，提高公民政治参与的热情。当前，中国网络政务的发展大大加速，公民可以十分方便地访问各级政府部门的网站，获得政府部门的相关信息，有些政府部门开辟有网上论坛，公民可以发表自己的意见和看法，对政府部门的工作进行监督。近年来，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和广泛普及，作为一种反应快、影响大、参与面广的新兴监督方式，网络监督已经成为普通公民表达民意、维护权益、鞭挞腐败迅捷而有效的工具。2010年12月，国务院新闻办发表《中国的反腐败和廉政建设》白皮书指出：“中国高度重视互联网在加强监督方面的积极作用，切实加强反腐倡廉舆情网络信息收集、研判和处置工作，完善举报网站法规制度建设，健全举报网站受理机制及线索运用和反馈制度，为公民利用网络行使监督权利提供便捷畅通的渠道。”<sup>23</sup>同时，网络政务的发展，使公民通过网络与政府领导人沟通变得比以前方便得多，容易得多了，这就大大削弱了科层制下的等级观念，提高了公民政治沟通和政治参与的便捷程度，从而可以有效激发公民政治参与的热情。如果说，在现代政治发展过程中，公民政治参与存在着精英政治朝平民政治发展趋势的话，那么，网络政治的发展毫无疑问加速了这一过程。总之，网络政治的兴起为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提供了十分便捷和重要的渠道，可以调动更多的人通过网络来参与政治，这对于扭转中国政治文化的非参与性，促进参与型政治文化的发展必然起到重要作用。

<sup>23</sup>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反腐败和廉政建设》，载《人民日报》2010年12月30日，第14版。

## 2. 推动中国政治文化向现代公民文化转变

网络政治的兴起可以推动中国政治文化向现代公民文化转变。网络政治能够消除现实政治过程中的沟通障碍，实现政治主体的平等性。这种平等既是身份的平等，也是话语权的平等。现实世界中社会地位的高低、经济收入的差距、教育背景的好坏、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差异，在网络空间中变得仿佛不存在了。同时，互联网不仅创造了新的信息传播方式，而且正在颠覆了一些传统的观念，使网民通过网络表达的政治诉求更容易展示其影响力。网络政治主体不再是被动的信息接受者，而是具有更强自主选择权力的主体，每一个政治主体都处在一个相对个人化的自主空间中，较少受到他人的监督与约束，也不必太多顾及社会环境的约束。这样一来，就可以提高网络政治参与者对政治体系的认同度，促进其政治参与的积极性，培养政治参与的主动性，增强政治参与的兴趣，促使他们更积极地参与政治生活和公共决策。

在网络政治参与的过程中，网络政治参与者会潜移默化地生成权利与义务意识、自主与平等意识，逐渐养成民主意识与民主作风，特别是会逐步增强公民意识，并不断摒弃臣民意识，这自然有利于公民政治文化的培育。随着网络政治的发展，中国公民的知情范围不断扩大，表达自由度不断扩展，监督与协商机制不断完善。同时，网络拓宽了政治参与的渠道和方式，使政治参与表现出“跨级多层次参与”特征，加上网络政治的开放性和去中心性，在很大程度上打破了层级和地域的限制。可以说，在网络中，每个人都是一个平等的政治主体，都可以平等享用自己所需要的信息资源，与别人平等地进行交流和表达自己的思想、看法和情感。这样，就可以增加政治参与的广度、宽度和效度，从而有利于公民意识的生成和公民文化的发展。

## 3. 推动中国政治文化更加倾向于理性、温和与客观

网络政治中开放性和互动性环境为政治文化的转变创造了一种新的媒介，在这种环境中，政治文化倾向于理性、温和与客观具有一定的必然性。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具有明显的非理性化倾向，追求人治理想和权威主义；而西方政治文化传统具有较强的理性化倾向，追求规范化和理性化的政治制度结构。当前，随着改革开放与社会进步，中国公民的政治态度开始倾向于理性、温和与客观，其政治效能感也得到了优化和提升。在现阶段，中国网民对网络舆论环境和自身网络行为影响的认识还十分有限，导致中国网民的网络行为有时候表现得比较幼稚，偶尔会出现一些非理性和不成熟的举动，这可能是网络发展的初始阶段中国网民要付出的学习成本。但是，在网络环境中，互联网所提供的信息采集技术、信息导航技术、信息诠释技术和信息控制技术等使参与者获取信息、传播信息、分析信息和使用信息的能力和自由度大大提升，公民拥有足够的信息资源对自己的观

点和看法进行深层次的思考，并不断修正和丰富自己原有的思想；网络政治过程的开放性、互动性和平等性，使网络政治的透明度增大、信息量增加、交往频度增强，这必然提高网络政治参与者的学习能力、认识能力和辨别能力；网络集成了各式各样的信息服务系统，它能作为相对独立的主体，根据参与者的意图进行政治信息的采集、存贮、加工、处理，参与者可以对网络信息进行筛选，并对其价值进行评估和鉴定。这样，网络政治参与者对政治事务的认识和理解就会倾向于理性、温和与客观，从而推动中国政治文化倾向于理性、温和与客观。

网络的开放性极大地降低了公民政治参与的门槛，使公民获得了政治参与的平等机会，他们可以通过合法有序的途径提出个人主张、反映个人意见，解决个人在政治过程中遇到的一些问题，这样，就会使他们更倾向于采取理性、温和的手段处理问题，有助于培育他们理性、温和的政治态度。可以说，随着网络政治发展、社会物质条件改善和个人独立性增强，中国公民的政治情感日益趋向温和，极端化和暴戾化的情绪可能在某些突发事件过程中会显现出来，但其影响总体而言必然会越来越小。当前，马克思主义已经成为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共同理论基础，在中国政治文化中居于主导地位。但是，也应注意到，随着网络通讯技术的进步，全球文化交流的活跃与发展，许多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思潮也开始在中国社会中占据一定的地位，例如：自由主义、保守主义、新“左”派、生态社会主义、实用主义、民粹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现代犬儒主义、后现代主义等社会思潮的影响明显得到扩展。同时，由于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实施，宗教在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的作用也越来越大。这样，在优先建设主流政治文化的前提下，还应当关注政治亚文化的发展动向，引导政治亚文化朝着理性、温和、宽容的方向发展，及时扭转政治亚文化走向激进化、极端化和非理性化的倾向。<sup>24</sup> 在网络政治文化的转变过程中，可以通过强化对公众主流价值观和先进政治文化的引导教育，让公众健康的需求支撑文化的健康发展；并使网络信息发布者和网络政治参与者认识到自己的社会责任，自觉地使自己的政治行动习惯和政治行为方式倾向于理性、温和与客观，符合先进政治文化表现出的特征和要求。

#### 4. 推动中国政治文化更加倾向于民主、公平与透明

政治文化一定程度上规定了影响政治输入和政治制度运行的思维、情感和行为模式，同时，又被社会成员视为一种权威性的内在力量。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互联网的扩展和信息通讯技术的广泛使用，一种新的民主形式——网络民主（cyberdemocracy）开始出现。与之相伴的，学术研究也开始关注到这一领域，网络民主、数字民主（digital democracy）、电子民主（electronic democracy）

---

<sup>24</sup> 何增科等：《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版，第31页。

等概念先后产生。<sup>25</sup> 马克·波斯特（Mark Poster）认为：“网络民主意味着出现了一种可能性，这就是用笛卡尔空间（Cartesian Space）表达的传统的集会或政治领域可能在网络空间（Cyberspace）中得到扩展和加强。”<sup>26</sup> 网络政治极大拓展了民主的含义和领域，强化了公民的民主意识，使参与者可以切实体验现代政治生活的民主性。有研究表明，网络参与者的民主精神比一般公民要更强。<sup>27</sup> 当前，中国网络政治在现实政治实践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越来越多的网民通过网络表达意见建议和进行政治参与，党和政府也越来越注重利用网络问政、网络咨询决策和网络信息发布来倾听吸纳民意和提高行政效率。同时，党和政府一定程度上对网络曝光和网络反腐采取了支持态度，对网络舆论保持着适度宽容，从而使网络曝光和网络反腐往往能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这种立竿见影的效果又激励了更多网民采取这种方式来实现自己的目的，从而使社会中的不良情绪可以通过这种形式得以释放，同时，也使公民可以通过这种相对缓和的方式来对社会中的不良现象和腐败问题进行抨击与揭露。这样，网络政治的发展就会增强和培育中国公民的民主意识，也会培育各级党政机关领导者和工作人员的民主作风。

在网络政治中，网络为政治活动提供了充分沟通和公平展现的媒介，政治活动和政治过程往往表现得更加平等和公开。网络是基于资源共享、互惠互利的目的建立起来的，公众进入网络获取信息、交换意见、表达观念时，相互之间是完全平等的，他们可以更自由平等地畅所欲言。网络政治具有非常显著的互动性优势，它使得网络政治过程不再是一个被动过程，而是网民积极参与和互动的过程。由于网络空间的虚拟性、匿名性和去中心化等诸多特点，网络被政治权力所渗透和控制的可能性极小。首先，从信息的获取来看，受众从被动的信息接受者转为主动的信息寻求者。在网络传播中，受众的自立性大大增强，他们不再是像看报、听广播、看电视那样等着有限的信息传送过来而去被动接受，而是能够根据个人的需要、兴趣和时间去选择信息。其次，从受众参与传播过程的情况来看，受众从单纯的信息接受者转为既是信息的接受者，又是信息的传播者。这种双重

<sup>25</sup> See Roza Tsagarousianou, Damian Tambini and Cathy Bryan (eds.), *Cyberdemocracy: technology, cities, and civic networks*, New York: Routledge, 1998. Barry N. Hague and Brian D. Loader (eds.), *Digital democracy: discourse and decision making in the Information Age*, New York: Routledge, 1999. Matthew Hindman, *The myth of digital democrac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9. Thomas B. Riley, *Electronic governance and electronic democracy: living and working in the wired world*, London: Commonwealth Secretariat: SFI Pub., 2000. Graeme Browning, *Electronic democracy: using the Internet to transform American politics*, Medford, NJ: CyberAge Books, 2002. Rachel K. Gibson, Andrea Römmele and Stephen J. Ward (eds.), *Electronic democracy: mobilisation, organisation, and participation via new ICTs*, New York: Routledge, 2004.

<sup>26</sup> Mark Poster, “Cyberdemocracy: The Internet and the Public Sphere”, in *Virtual Politics: Identity & Community in Cyberspace*, ed. by David Holmes, London: Sage Publication, 1997, pp.212-228.

<sup>27</sup> See Kevin A. Hill, John E. Hughes, *Cyberpolitics: Citizen Activism in the Age of the Internet*.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 1998, p.42.

角色使受众的自主性和主体性得到了充分实现。再次，从受众获取信息的方式来看，受众从单一方式接受信息转变为多种综合方式获取信息。网络把声音、文字、图像、视频、色彩等多种形式综合于一体，大大开阔了受众的视听界。这些特点无疑会促进政治活动的公平化与透明化，有助于公民和政治组织形成公平与透明的政治行为方式，从而推动中国政治文化更加倾向于民主、公平与透明。